

文史知识

潮汕文化笔谈

饶宗颐等

杜经国

潮州王门学派

黄挺

潮汕文化的形成与发展



唐宋时期潮州的陶瓷生产和外销 庄义青

林伦伦

潮汕与海上丝路

陈高华

潮汕方言的特点及其学术价值

潮汕文化专号

中华书局 97 * 9

原书空白

原书空白

文明昭盛世
史鑑啓後人

文史知識潮汕文化書刊出版紀念

吳南生



地方史料与国史可以互补

饶宗颐

地方问题的研究，近时在西方史学界形成一股新的趋向。吾国地记、地志之学，萌芽甚早，六朝以来已有高度发展。这一学科绵延已逾千年之久。国史必资地志为材料的要删，而地方研究，必从全国立场来看问题，才能高瞻远瞩，轻重得宜，切中肯綮，不致流为乡曲武断的庸俗看法。

韩愈在潮州影响深远。过去我提倡韩学的研究，至今已开过两次“韩愈学术研讨会”。他由于辟佛，方才被贬到潮州。他为了反对佛教，必先对佛教有一点认识。1962年冬天，我在印度从事研究工作，读马鸣(Aśvaghoṣa)的 Buddha-carita(佛传)。由取后汉竺法兰、北凉县无讖、刘朱法云、隋代崛多诸家的《佛本行经》译本，一同对读，发现《破魔品》中有大量的“或”字，县译是五言诗体，因而悟出韩愈的《南山诗》即脱胎于此。我曾著文讨论，引起许多关心佛教文学的学人之重视。后来我读梁僧祐的《弘明集》，首篇即是牟子《理惑论》，有一段这样说：

牟子曰：事尝共见者，可说以实。一人见，一人不见者，难与诚言也。昔人未见麟，问尝见者，麟何类乎？见者曰：麟如麟也。问者曰：若吾尝见麟，则不问子矣；而云“麟如麟”，宁可解哉！见者曰：麟，麋身、牛尾、鹿蹄、马背。问者虚解。

雄辩地讨论麟的形状问题，我又恍然于韩愈何以撰写《获麟解》一文，必受到牟子的启发。他说：“麟之为灵昭昭也，杂见於传记百家之书。”应亦包括牟子在内。牟子亦云：“昔杨墨塞群儒之路……益轲辟之，乃知所以。”这些话，韩文常套用之。《弘明集》里面反驳顾

欢《夷夏论》的文字很多。韩氏辟佛是从夷夏观点出发，与顾欢同一立场。可见《弘明集》应是他案头上经常的读物。我曾在《选堂赋话》里指出《谏佛骨表》开端“佛者，夷狄之一法”是模仿晋代蔡謨的“佛者，夷狄之俗，非经典之制”。宋邵博说他是“广傅奕之言”，是不对的。

至于韩愈与大颠交往的事情，久已成为文学史上一段公案。大颠事件，钱钟书先生在《谈艺录》中亦谈到。我所知道的潮州地方有关大颠的材料，还有许多可供补充和仔细讨论（请参看拙作《宋代潮州的韩学》）。我常说地方史料与国史可以互补，相得益彰。喜欢讨论学术问题的同好，一定会同意我的说法，这一点可以说明我所以特别重视乡邦文献的缘由。

1997年3月于香港

· 笔谈 ·

选堂先生与选学及潮学

姜伯勤

倡说“潮州学”的饶宗颐先生，字选堂。在《选堂字说》一文中，饶先生说：“或问于余曰：子曷以选堂名斋？应之曰：平生治学，所好迭异。幼嗜文学，寝馈萧选；以此书讲授上庠历三十年。”

萧选，即梁朝昭明太子萧统所编的中古诗文总集《文选》。选学，即“《文选》学”。“《文选》学”一名见于《旧唐书·曹宪传》和《新唐书·李邕传》，可见“选学”兴于隋唐，集大成者为李善。陆游的《老学庵笔记》，记有“《文选》烂，秀才半”的谚语。隋唐时考试以《文选》出题目，所以它曾经是一部学子必读之书。但是，五四以后，因为提倡白话文，把有的骈文作者称为“选学余孽”，以致后来的少年人对《文选》十分隔膜了。

当选学被疏远的时候，饶宗颐先生仍然以一种独立不移的人文精神，以“中流自在心”，在香港、新加坡诸地，以“选学”讲授于各

大学凡 30 年。

宗颐先生对选学也作出自己的贡献。在校注方面，著《日本古钞文选五臣注残卷校记》和《敦煌本文选斟证》一、二，见《新亚学报》三卷一期（1957 年）、二期（1958 年）。在解析方面，著《文选解题》、《读文选序》，见《文轍》。又如《答李直方论〈文选〉赋类分情志书》，见《固庵文录》，有十分深入的观察。如说：“以情志区别文体，肖选已然”，“其所谓情，大抵指人欲而言”，“仍是旧义”。而《文心雕龙》之所谓“情”乃“广义之情”。“萧统文学见解，仍在正情，彦和则言摅情耳，此两家之不同，不可不察也”。则《文选》的见解是道德正人欲，即正情。《文心雕龙》所言情为一般“情感”之意，即舒展情感。

陈槃先生《固庵文录·书后》云：“固庵精熟文选理，以选名其堂，所作沈博绝丽，挹让于陆、潘、任、沈之间。”在学术与艺术分离的今日，在学问与文章疏离的今日，宗颐先生学术与艺术俱精，学问与文章并进，乃得力于先生善于承继中国传统文化，其中包括“精熟文选理”。

饶先生在《潮州学在中国文化史上的重要性——何以要建立“潮州学”》一文中指出：“潮州人文现象和整个国家的文化历史当然是分不开的。”从饶先生的身上可以看到，潮州人文的发达，与唐以后“韩学”即韩愈学的流风余韵分不开，也与对唐以前之“选学”的汲取和继承分不开。

（作者单位：中山大学历史系）



认识—研究—再认识—再研究

——关于潮汕文化的一些想法

詹伯慧

潮汕文化是中华民族文化中具有鲜明地域特色的一支。在大力弘扬中华传统文化的今天，自然也要大力弘扬潮汕文化；而大力弘扬潮汕文化，当务之急是认识潮汕文化，研究潮汕文化。认识—研究—再认识—再研究，这应是我们对待潮汕文化的基本态度。

潮汕文化历史悠久，并不等于潮汕文化的研究也历史悠久。和中华主体文化相比较，历代学者对潮汕文化的研究是很不充分的。有些涉及潮汕历史、潮人历史的问题，迄今仍未得到有力的论证。潮汕文化到底蕴含哪些内容？我想是没有多少潮汕人能够说清楚的。潮汕人津津乐道潮州菜如何精美，功夫茶如何甘香，潮州戏曲、潮州音乐如何令人陶醉，年长一点的潮汕人还会谈起潮州抽纱、潮州柑桔、潮州瓷器如何蜚声海外，如此等等，几乎无人不知。然而，我们仔细想想，难道潮汕文化就只有这些？在民俗风情、历史文物、自然景观、文艺美术等许多方面，作为地域文化的潮汕文化又有哪些突出的表现？这些都需要我们去发掘，去研究。值得高兴的是，近几年来，潮汕地区对地方文献、民风民俗、乡音土谈的搜集和整理盛极一时，介绍乡土文化的书刊也常有问世，研究潮汕历史文化的学术机构（如《潮汕历史文化研究中心》）亦纷纷成立，学术刊物（如《潮学研究》）和学术会议（如潮州学国际研讨会）也陆续出台，说明潮汕文化已经打动潮人的心，正受到海内外潮人、特别是学术界潮人的深切关注，一个研究潮汕文化的氛围已经开始形成。然而，如果从加深认识潮汕文化，加深研究潮汕文化的要求出发，目前已有的研究显然是很不够的。就宏观的研究来说，几年前

杜松年先生出版了一本名叫《潮汕大文化》的书，从历史发展的视角，比较全面地论述了潮汕文化的方方面面，可说是开了一个好头。饶宗颐先生在序言中说：“潮汕历史文物，一向为国人忽略。得君此书，对地方文化传统之发扬，甚具意义。”饶先生所说的“一向为国人忽略”，是毋庸讳言的客观现实，这也正是最需要我们深思的问题。只有沿着历史发展的轨迹，客观地、冷静地观察呈现在我们面前的种种文化现象，才能准确把握住潮汕文化的实质，也才能更深刻地认识潮汕文化的精华所在，亦才能在弘扬潮汕文化时做到扬其精华，弃其糟粕。借此机会，我想就几个有关问题，略谈个人的点滴想法：

一是韩愈治潮的问题。韩愈被贬刺潮时间极短，从元和十四年(819)的三月二十五日抵潮到十月底调任袁州刺史，前后还不够8个月的时间，竟能够在潮州产生如此巨大的影响，以至于像民间所说的“江山改性韩”，表达了人民大众对他的无限敬仰。在回顾这段重要的历史时，可以从中吸取到什么珍贵的经验？据说韩愈的主要政绩共两条：一条是大办教育，以教治潮；一条是祭鳄鱼为民除害。这两条合到一块，其实也就是我们今天大家常挂在嘴上的“为人民服务”。韩愈办教育提高人民的素质，祭鳄鱼保障人民的安全，都是实打实的。我们今天深入研究韩愈治潮，我看就可以从中悟出一个很有现实意义的道理来：只要立下决心为人民服务，哪怕只有几个月的功夫，是同样可以横下一条心，干出一番人人叫好的业绩来的。韩愈的成功治潮，留给世代潮汕人民的，正是这一顺应民心、为民造福的坚定信念和可贵可敬的精神。

二是近几年看到一些论及潮汕文化的著述，总要提到潮人善于经商，提到一批散居海外各地的潮籍巨富，盛赞他们的显赫业绩和成功之道。在这里，我认为有两个相关的问题需要加以重视：其一是对待这些“生财有道”的潮商，我们要从哪个角度入手来把他们跟潮汕文化挂上钩，才能顺理成章地在弘扬潮汕文化中，也宣传、推介了潮商的成功经验，把潮汕文化的研究和当今的经济建设、现代化建设紧密地结合起来。其二是对潮商在经济上的成功

有必要作全面的分析研究，哪些是他们取得成功的好经验、好方法，需要加以推广的；又有哪些不足之处，哪些属发展过程中受到过的挫折和失误，需要引起注意，及时总结出教训来的。这些年来，对潮商在海外的业绩有过许多赞颂的宣传，“潮商精神”早已名噪海内外。但同时外界也有一些迹近批评的声音传到我们的耳边，褒贬不一的议论正需要我们作细致的分析研究，实事求是地把潮商精神的主流和不足都端出来，力求达到扬长避短的效果。

三是关于海洋文化问题。常听到有人说：潮汕文化属于海洋文化，跟平原文化、高原文化不同。言下自然是表明海洋文化为潮汕文化的一大特征。每次接触到这个问题，我的脑子里不免引出许许多多的问号来：什么是海洋文化？是不是地处海边的地域性文化必然都属海洋文化？海洋文化具有哪些突出的特征？这些特征是如何形成，如何发展起来的？还有：潮汕的海洋文化与整个中华文化的关系如何？与邻近的广东沿海、福建沿海的文化关系又如何？潮汕海洋文化算不算岭南文化的一部分？如此等等。每一个问题都需要作深入的探讨，都需要通过充分的论证才能得出正确的答案。我不赞成简单化地把海洋文化视同以商品经济为基础的文化，或视同最容易与近代资本主义沟通的文化。文化是不是都要无例外地依附于一定的经济体制或经济模式？这个问题可是个不小的理论问题，还是多作研究，慎下结论为好。

总之，潮汕文化中值得研究、值得探讨的问题是很多的。现在有了潮州学研讨会，有了《潮学研究》这个学术性很强的刊物，给深入研究、相互切磋潮汕文化中的一些问题，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可以预期，通过不断深入的研究，潮汕文化定能为更多的人所认识。这朵南国滨海的文化奇葩，定能在中华文化的百花园中开放得更加绚丽夺目，更加光彩照人。

（作者单位：暨南大学中文系）

潮汕文化的形成与发展

· 历史百题 ·

杜经国

潮汕文化是中华文化的一个分支，在潮汕地区（以现在的汕头、潮州、揭阳三市为中心）自然环境的影响下，于漫长的历史发展进程中逐渐形成。

潮汕地区位于东经 $115^{\circ}06'$ — $117^{\circ}20'$ 、北纬 $22^{\circ}53'$ — $24^{\circ}14'$ 之间，地处中国大陆的东南隅，广东省的最东端，与福建省毗邻。潮汕面对滔滔大海，南海和台湾海峡在这里交接。潮汕与台湾南端，为一衣带水。潮汕总面积 10346 平方公里，其地形大势，西北高而东南低，东北和西北多高山，东南面海，形成一个内陆比较封闭，而有很长海岸线的地理小区域。这种地形地貌特征，对潮汕文化的形成起着相当大的作用。

潮汕文化包含着不少的文化特质，这些特质构成了既与共存于同一地域中的畬族文化、客家文化不同，也与周边其他地域文化有异的一个体系。在这些文化特质中，语言是最具有区别性特征的一种。因而，我们把潮汕文化理解为由讲潮汕话的民系所创造的一个文化共同体。

潮汕文化是一个动态的开放体系。它的形成过程，是本地土著文化和中原移民文化经过多次互相影响、互相吸收而逐渐融合的过程。在形成自身特色之后，由于潮汕人的迁徙，潮汕文化向外传播，同时也吸收了其它文化的因素，不断发展。

距今 8000 年以上的南澳象山文化遗址，与闽南的“漳州史前文化”属于同一个文化系统。距今 6000—5500 年前后的潮安陈桥文化遗址，仍然表现出与闽南同一时期文化遗址（例如平潭县海坛岛壳丘头文化遗址）接近的文化风格。而陈桥遗址出土的陶器，具有河姆渡文化夹砂、夹蚌陶器的特色。距今 3500 年前后的普宁后

山文化遗址出土的鸡型壶，其祖型——垂囊（盎）最先出现于河姆渡第三期文化。可以说，这 4000 余年间，本地原住民创造的新石器文化，可以归属于长江下游以太湖为中心的东南文化区（文化区划分依苏秉琦说，见《关于考古学文化的区系类型问题》，《文物》1981 年第 5 期）。

1974 年以后本地发掘出数目较多的被称作“浮滨文化”的文化遗址，其年代稍后于后山文化遗址，距今约 3400—2900 年（相当于商代中后期到西周前期）。浮滨文化中，明显含有中原商文化的因素。但是这种因素已经融合于土著文化，发生了变异。浮滨文化仍然是一种面貌独特的土著文化。

距今 2700—2200 年（相当于春秋战国时期）的潮汕考古遗址中，南越族特有的夔纹陶器已大量出现，说明在这一段时间里，南越文化以很强劲的势头渗入本地，并改变了土著文化的面貌。

一直到秦汉以后，汉文化才对本地区有所影响。然而，即使到汉代，这种影响也还是通过南越间接传入的。而且在这一时期，本地区文化的汉化程度，也远远不及珠江三角洲地区。

晋唐时期，中华主流文化在本地区的影响逐渐扩大。这一时期主流文化与本地土著文化的交流融合，有三个情况值得我们注意：其一，东晋义熙九年（413）置义安郡，是本地区州郡一级建制的开始，它说明本地在编人口的增加。这些新增在编人口，来自南迁的中原移民。但是，在这一阶段，南来的中原移民与本地土著似乎处于一种隔离状态。80 年代的文物普查中，本地区发掘了东晋六朝砖室墓近 10 座。这些墓葬，从墓室的形制到出土的殉葬品，完全保留着中原的风格，与江南地区同时期的墓葬几乎没有什么区别，这可以使我们觉察到移民与本地土著之间关系的疏远。其二，隋唐之交，广州俚帅杨世略据有潮、循二州（《新唐书·高祖本纪》），土著势力在本地区仍然占据着优势。高宗武后时，陈政、陈元光父子与 58 姓军校屡次平定泉、潮间蛮僚啸乱，实际上是中原文化与本地土著文化通过战争的形式不断地互相接触的过程。其三，元和十四年（819）韩愈贬潮后兴办乡校是一个人所熟知的事件。韩愈

的《潮州请置乡校牒》说，潮州以前虽有学校，却荒废已久，读书人少，百姓和官府的下层办事人员文化素质都很差。因此，他捐了俸钱办学，并举荐赵德为教师。苏轼认为，韩愈贬潮之前，“潮之人未知学，公命进士赵德为之师，自是潮之人笃于文行，延及齐民，至于今号称易治”（《潮州韩文公庙记》）。这种说法，自吴澄而下，多有人反对。若从潮州人口的教育程度和整个社会文化的发展着眼，苏轼把韩愈视为开始向社会中下层普及儒家文化的代表，视为转变潮州社会风气的百世之师，是无可非议的。

宋元时期，闽文化的西渐是潮汕文化形成的重要环节。此时，闽文化空前繁荣，中华主流文化以闽文化为中介，对本地区影响的力度加强。时至今日，历史上政区基本上隶属广东的潮汕，文化面貌却接近闽台，就是在这一时期打下基础的。

宋元时期闽文化的影响本地区，主要通过两个途径：一是闽籍官师的宦仕潮州。宋代潮州职官多闽人，以知州为例，北宋知州籍贯可考者 30 人，闽人 17 人；南宋知州籍贯可考者 63 人，闽人 36 人。属官中闽人更多。当时闽籍仕潮官师，尊崇韩愈，慨然以兴学明道为己任。对此，饶宗颐先生在《宋代莅潮官师与蜀学及闽学》一文中已有详论。宋代潮州的教育比唐代有显著的发展。据明嘉靖《潮州府志·选举志》载，太平兴国四年（979），谢言以“草泽应诏，进士及第”，自此后到宋末止，潮州共有 139 人登进士第。这一批精英，是在民众教育程度提高的状况下出现的。随着教育的发展，中华主流文化在潮州迅速传播，潮州社会文化的发展水平已经接近于发达地区，故《方輿胜览》有“封疆虽隶于炎方，文物不殊于上国”之誉。闽籍官师的兴学传道，在其间起了很大的作用。二是闽人的移民潮州。晚唐以前，潮州无论从全国还是从广东看，都属于荒僻之区，人口稀少。北宋以来，韩江三角洲的开发利用，使本地区的生存环境日益改善，来自闽地的移民日益增多，人口数量发展很快。根据梁方仲先生《中国历代户口田亩田赋统计》，潮州唐宋元三代人口密度为：唐代，每平方公里 1.2 人，在全省 27 个州中排第 23 位；北宋，每平方公里 4.5 户，在全省 23 个州军中排第 5

位；元代，每平方公里 27 人，在全省 23 个路州军司中排第 3 位。可见，宋元时期本地区的人口数量已经跃居全省前列。闽人移民潮州在文化上的意义，首先是促使本地区生产力的发展。随着农业和手工业生产水平的提高，海上运输和贸易活跃起来，潮汕人的善贾，在此时已见端倪。其次，移潮闽人之中多宦仕与世家，其中有很多成为本地望族（饶宗颐《潮州志·民族志稿》）。潮汕人至今重视宗族血缘关系，应于此时奠定基础。再次，将闽地风俗，从方言、民间宗教信仰到日常生活习惯带入本地区，闽潮同俗，自此时已然。

明清时期的海防政策，对潮汕文化的形成起着决定性的影响。明朝建国伊始，便出于巩固政权的需要，施行锁海政策。这一政策直接影响着明代潮州社会的整个发展进程。

海禁政策使宋元以来潮州发达的海上贸易，受到极大的冲击。潮州海商为了继续从事海上贸易，多冒充贡使，或以通事身分，诱番船以入贡为名前来通商。而海禁稍松，潮州海商又络绎私自出海贸易。正德年间，明政府鉴于广东地方海上贸易不可禁绝的事实，允许海外商舶由“官府抽分，公为贸易”（《明武宗实录》卷一一三），潮州民间私舶往来交易遂有进一步的发展。明世宗即位之后，朝廷又严海禁之令。这时，潮州的海上私市贸易已经不可抑止，南澳成为南中国海上私市贸易的中心。中外商人贸易交接于此，而后放发商舶，南下北上。从事这种海上私市贸易活动的团伙，往往以武力对抗海禁；又恃其武力攻掠村寨，截劫商船，以祈取得更多的财富，酿成了几十年的潮州海寇之乱。

明代海上贸易的兴衰起伏，在潮州的社会、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产生了连锁性作用。

由于实行海禁，原来地狭人稠、居民多以懋迁为业的福建下三州，有大量的移民迁入潮州，使本地区的人口数量持续发展。有了充足的劳动力资源，韩江三角洲得到了进一步的开发。水利的兴修和双季稻种植面积的扩大，使本地的粮食产量平稳上升。这一时期，潮州仍有余粮可以输出福建。在人口增长的刺激下，农业商品化的倾向明显加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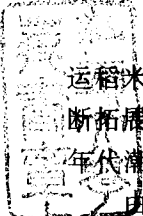
农业经济的商品化，促进了本地区手工业和商业的繁荣。得到甘蔗、棉麻生产的支持，制糖、纺织等新行业悄然兴起。入明以后因为海禁妨碍外销而呈现衰退气象的潮州陶瓷业，到嘉靖年间又重新发达起来。潮州所产的青花日用瓷，远销东南亚一带。同时在海禁私商贸易刺激下，造船、矿冶等行业也相当兴旺。

由于民间贸易日益活跃，潮州从事手工业生产和商业活动的人口剧增。潮人善贾的特点，因此而进一步加强，成为传统。

经济的增长，促进了文教的发展。洪武八年(1375)，朝廷诏有司立社学，但在潮州并未见施行之效。正统元年(1436)，潮州知府王源在本州设立社学，举行乡约。到正德嘉靖间，潮州士绅薛侃等从学王阳明，复回本地聚众讲习王学，并积极推行乡约。其时，广东督学魏校也传檄各府县毁淫祠，立社学。由于官师和士绅们的努力，儒家文化渗透到下层社会，追远报本、荣宗耀祖的理念为潮汕人普遍接受。

嘉靖以后朝廷的严海禁之令和因此而加剧的海寇之乱，在两个方面对潮州社会与文化的发展有着深刻的影响：一是嘉靖万历年间，纵横东南沿海的几个大海寇商人集团，在明政府军事高压的逼迫下，出走东南亚，成为早期潮籍移民。这些海寇商人的滞留海外虽然是被迫的，但他们在东南亚的开拓，却为清代以后的潮汕移民奠定了基础。二是沿海一带大村寨的建立。明末海寇之乱，本地居民多聚族自保，或一村筑一堡，或数村合一寨，武装自卫以御敌。这使潮州的农村形成了一批人口高度密集的大聚落。如和平、鸥汀、庵埠、塘湖、冠陇、南洋、樟林等，聚众多以万数。大型村寨的形成和自立，导致宗族势力的强大，潮汕人的宗族观念也由是而强化。

从明万历后期开始，本地区经历了数十年的动乱，一直到康熙二十三年(1684)清朝平定台湾，弛东南海禁，潮州社会才进入一个相对稳定的时期。此后五六十年间，人口增长的速度较快。到乾隆中叶，本地区的粮食产出已经不敷自给。人口的压力，对本地区的社会经济文化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为了解决粮食问题，有着悠久海外贸易传统的潮州商人，在政府的许可下，打造洋船，从暹罗转



运稻米进口。从稻米交易开始，潮州商人在东南亚的商贸活动不断拓展。与此同时，大量的潮州商民移居暹罗，形成 18 世纪七八十年代潮州人向东南亚的第一次移民高潮。

由于人均耕地面积日益减少，农民为了获得更高的劳动价值，只好扩大经济作物的种植，由此导致农业生产进一步商品化。出现于明代后期的制糖、棉纺业应时而发达起来，潮糖、潮毯、潮蓝布闻名南北。这又使得更多的潮州人有可能专业从事商贸活动。清代的科举制度限制了许多读书人的仕进，而本地发达的商贸业给他们提供了施展才能的机会。儒生的业贾，大大提高了潮州商人的素质；捐纳制度，又能给业贾有成者带来与仕进相当的荣耀。这样，在潮人善贾的传统上又添加了重商的成份。

清代的潮商活跃于国内外市场。随着商人们的走南闯北，本地的一些独特的民俗事象，例如潮州戏、潮州菜、工夫茶，在与中华文化其它地域分支的交流中定型，成为人们愿意承认，也乐于接受的文化特质。

汕头开埠(1860)以后，由于历史条件和社会环境的变化，潮汕文化有了一些新的发展。这一时期，潮汕和中国其他地区一样，传统文化正面临着西方文化的冲击，经历了一个革旧易新的过程。例如，汕头开埠以后，新式学堂大批出现。道光二十九年(1849)到宣统三年(1911)的 62 年间，潮汕地区改、创办的新式学堂，就其较主要者统计，已经超过 100 所。教育模式的现代化，驱动了潮汕文化的进步。潮汕人从生活方式到思想观念，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一时期，潮汕又出现了三次向东南亚移民的浪潮，时间分别为 1870—1910 年、1926—1933 年、1945—1949 年。这三次移民潮，导致了海外潮人社会的生成。海内外两个潮人社会的密切联系与交往，也促动了潮汕文化的新发展。

潮汕文化的新发展，在它的很多文化特质上面都有所表现，而最主要还是反映为文化心态的进步。具体地说，在两方面：

一是宗族观念的拓展。明清时期本地区的社会历史条件，使潮汕人形成了十分强烈的宗族观念。在这种观念的笼罩下，当一

个潮汕移民赤手空拳来到异乡,首先想到的是投靠自己的宗亲,再谋求发展;而后者也会义不容辞地接纳他。易于立足,无疑是海外潮人社会得以迅速扩大的重要原因之一。但是,这种狭隘的宗亲关系,也使早期海外潮人社会处于“小群可合,大群不可合”(梁启超《新大陆游记》)的松散状态。海外潮团的创立,远后于福建、客家和广府诸帮,就是明证。当时有人批评说:“自来国人于团结观念,散而不整,松而不固,此南北各地所同也。而我潮人尤甚,相形见绌,时见讥于人者。”(赖连三《香港纪略》)本世纪初起,这种情况显然有所改善。在有识之士的倡导下,海外潮团组织纷纷成立。海外潮人在加强团结的同时,更加关心祖国和家乡。他们在潮汕办工厂,建学校,热心慈善事业。有不少海外潮人在辛亥革命和抗日战争中,倾斥家资,甚至献出生命。随着时代的进步,海外潮人狭隘的宗族观念拓展而为爱乡爱国的思想。高度的凝聚力,成为潮汕人文化心态的一大特点。1981年以来由世界各地潮团组织轮流主办的国际潮团联谊大会,声势之浩大,影响之深远,正足以证明潮人凝聚力之强。

二是开拓精神的发扬光大。明清时期,受地理环境和人口压力的双重挤压,潮人出海经商和移民海外的风气日见炽盛,形成一种不避冒涉风涛,向海外发展的传统,孕育出勇于开拓的心态。近代以来,潮汕人的开拓精神进一步发扬光大。最能说明问题的,就是近几十年来潮商经营方式的转型和业务的拓展。与中国乡土社会的传统观念相应,早期潮商的经营,采取家族管理的方式,所有权和经营管理权合一。自80年代起,已经有一定经营规模的潮人工商业,逐渐采用现代化的股份制管理形式,任用有能力有经验的高层干部进行管理,把所有权和经营管理权分开,使企业管理模式更加开放。与此同时,很多潮人企业家积极拓展经营领域,从传统工商业向金融地产、交通能源、高新技术等行业进军,进而打破行业与地域界限,组成国际性大集团公司,加强了竞争能力,取得了卓越的成就。潮汕人勇于开拓的文化心态,在这些企业家身上表现得最为突出。(作者单位:汕头大学潮汕文化研究中心)